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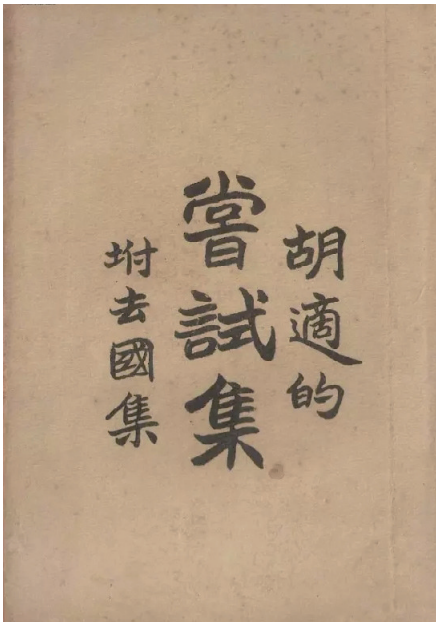
早期中国新诗的本土化探索及其启示

□张洁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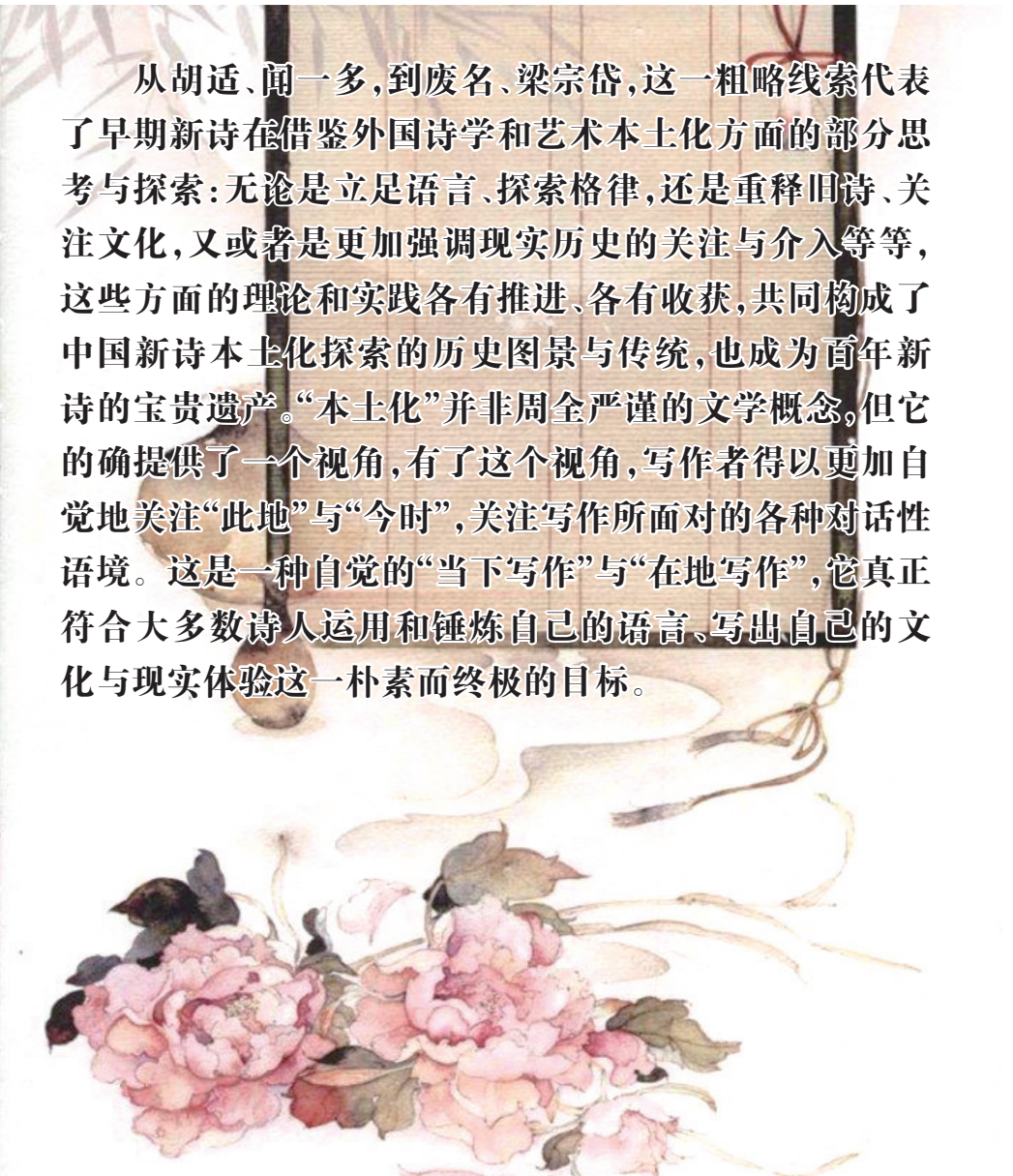
——

1922年,胡适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放脚鞋样”一说后来不仅常被用来比喻胡适过渡性的历史地位,而且也多用于形容新诗发生期的困惑,即在“新/旧”二元标准下,新诗如何处理自身与旧诗传统和西方诗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早期新诗对旧诗的反叛姿态和取法西方诗学资源的做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某种“薄古”“厚西”的倾向,甚而有时会造成评判标准上的古今中西的混淆,即把“中”等同于“古”、“西”等同于“今”的简单化现象。这在当时的语境中可以理解,但也必然在后来的诗歌史中被不断反思。比如梁实秋1931年提出的“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的说法,即是一种反思性批评。1932年,胡适本人也在反思中适度修正了以前的说法,他说:“我当时希望——我至今还继续希望的是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这是我理想中的‘新诗’的意义——不仅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也不仅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来装进外国式的诗意的诗。’”在坚持“现代”追求的同时强调“中国”立场,这既体现了胡适本人诗学观念的调整,更说明了“本土化”问题在新诗史上开始受到关注。



1930年代中期,废名在北大课堂“谈新诗”时曾说:“新诗作家乃各奔前程,各人在家里闭门造车。实在大家都是摸索,都在那里纳闷。与西洋文学稍为接近一点的人又摸索到西洋里头去了,结果在中国新诗坛上又有了一种‘高跟鞋’。”这个说法并不针对胡适,但巧的是两人都以鞋和脚来比喻,体现出诗学主张的差异。一方面,废名代表着“现代派”关于“化欧”与“化古”兼美的主张,对于直接“欧化”的“高跟鞋”有所批评;更重要的另一面是,与“放脚鞋样”相比,废名关注的重点已不是“新诗”之“新”,而是“新诗”之“诗”了。换句话说,当新诗已“站稳脚跟”,其“鞋”(艺术)的样式则比是否“天足”的问题更加重要。废名反对“高跟鞋”,提出要通过观察总结“已往的诗文学”找寻“今日现代派的根苗”,为新



诗的“天足”寻找一双属于自己的新鞋子。他特别认同林庚和朱英诞的诗,提出“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更重要,因为他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而在新诗里很自然的,同时也是突然的,来一份晚唐的美丽了。而朱英诞也与西洋文学不相干,在新诗当中他等于南宋的词……真正的中国新文学,并不一定要受西洋文学的影响。林朱二君的诗便算是证明。他们的诗比我们的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了。”事实上,说林庚朱英诞“与西洋文学不相干”并不准确,但废名此说强调的是“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问题,无疑是在表达一种重建新诗审美标准的自觉。

二

1923年,闻一多为郭沫若的《女神》写过两篇著名的评论文章,分别题为《〈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在前一篇中,闻一多高度肯定了《女神》的“时代精神”之“新”,提出:“若讲新诗,沫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却对“《女神》之地方色彩”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女神》不独形式上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是一种

理论与争鸣/新闻

从胡适、闻一多,到废名、梁宗岱,这一粗略线索代表了早期新诗在借鉴外国诗学和艺术本土化方面的部分思考与探索:无论是立足语言、探索格律,还是重释旧诗、关注文化,又或者是更加强调现实历史的关注与介入等等,这些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各有推进、各有收获,共同构成了中国新诗本土化探索的历史图景与传统,也成为百年新诗的宝贵遗产。“本土化”并非周全严谨的文学概念,但它的确提供了一个视角,有了这个视角,写作者得以更加自觉地关注“此地”与“今时”,关注写作所面对的各种对话性语境。这是一种自觉的“当下写作”与“在地写作”,它真正符合大多数诗人运用和锤炼自己的语言、写出自己的文化与现实体验这一朴素而终极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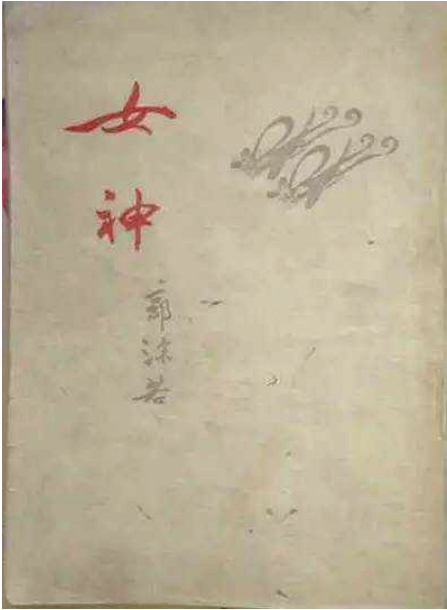


“地方色彩”的缺失。在闻一多看来:“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地吸收外洋诗底长处;他要作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他说:“我认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底经线,同地方底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我们的新诗人若时时不忘我们的‘今时’同我们的‘此地’,我们自会有了自创力,我们的作品自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这个然后才是我们翘望的新艺术了!”这两篇文章体现了闻一多诗论中不可割裂的一体两面:“地方色彩”和“时代精神”。而以往的新诗史则因偏于肯定郭沫若的“时代精神”而忽视了闻一多的深度与苦心,尤其忽视了他对“本土化”问题的独到思考。闻一多以“此地”的概念纠正了片面强调“今时”的偏至,提出新诗在“保存本地的色彩”和“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这个观点在新诗探索期的1923年堪称难能可贵。

闻一多所说的“地方色彩”包含“形式”与“精神”两个方面。他不仅批评郭沫若喜用“西洋的事物名词”甚至“夹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等写法,更不满于他“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以及过

于“富于西方的激动底精神”而“对于东方的恬静底美”的“不大能领略”的问题。也就是说,闻一多的本土化思想中包含了语言、文化、审美、现实等多个层面,而他后来着力提倡的“新格律”即可被视为其在语言方面的一种探索。

在此借用闻一多的一句话“新诗的格式是相体裁衣”来比较他与胡适、废名在新诗本土化问题上的理念:如果说“放脚鞋样”和“高跟鞋”都涉及脚和鞋的问题,但对于其间关系的分析却略显



浅弱,那么相比之下,闻一多“相体裁衣”的思想则更深入地思考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他不仅更自觉地把本土化作为一个目标,同时也将本土的语言、现实与文化特征放在了“体”的位置。诗艺的新衣正是要服务于“本地”之“体”,完成“时代底经线,同地方底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而“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冠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彩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才能“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而不是“将世界各民族底文学都归成一样的”。可以说,闻一多的“相体裁衣”纠正了早期新诗——甚至新文化其他领域中——混淆“古今中西”标准的偏颇,已然提出了一个更客观更全面的新文学标准。

三

真正实践并创造出中西诗学的宁馨儿的,是以废名、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一方面,“在白话新体诗获得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以后,它是无所顾虑的有意接通我国诗的长期传统,来利用年深月久、经过不断体裁变化而传下来的艺术遗产”,“倾向于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来重视中国旧诗风的继承”。另一方面,他们已走出非中即西、非新即旧的简单思维模式,自觉地将“现代的”与“传统的”、“外来的”与“本土的”诗学传统进行融合,不仅在实践上以“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同时在理论上兼收“纯诗”理论、英美现代主义诗艺和“晚唐诗风”等中国古典诗学资源。

即如那位批评“高跟鞋”的废名,英文系出身的他不仅没有盲目模仿西诗,而且以“高跟鞋”为喻批评简单模仿的弊害。他提醒说:“当初大家做新诗,原是要打倒旧诗的束缚,而现在却投到

西洋的束缚里去,美其名曰新诗的规律”,这是另一种值得特别警惕的新“八股”。废名强调“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的关系问题,不仅提出“胡适之先生所认为反动派‘温李’的诗,倒似乎有我们今日新诗的趋势”,而且还响应周作人“文艺复兴”的文学观念,认为“本来在文学发达的途程上复兴就是一种革命……中国文学发达的历史好比一条河,它必然的随时流成一种样子,随时可以受到障碍……西方思想给了我们拨去障碍之功,我们只受了他的一个‘烟土披里纯’,若我们要找来源还得从这一条河流本身上去找。”

相比于闻一多强调格律(语言角度)和审美(文化角度)的本土化主张,废名的重心更偏于对旧诗传统的重释和选择性发扬。比如他特别看重晚唐“温李”在感觉方式和传达方式上对新诗的启发,他曾说:“温庭筠的词简直走到自由路上去了,在那些词里表现的东西,确乎是以前的诗所装不下的。”他的“具体的写法”、“视觉的盛筵”、“驰骋想象”“并不抒情”也“用不着典故”,“给我们一个立体的感觉”;而李商隐的诗亦是如此,“作者似乎并无意要千百年后我辈读者懂得,但我们却仿佛懂得,其情思殊佳,感觉亦美”。在“温李”身上,废名看到了现代派诗所追求的自由与完整,也看到了这种长期未能受到主流文学史认可的诗歌美学是怎样在精神和技巧两方面都惊人地与现代诗学发生了联系。

与废名相比,同属“现代派”的梁宗岱既有对旧诗传统的重视,但又有不同的侧重。1935年,身为《大公报》“诗特刊”主编的梁宗岱在该刊的发刊词中提出,新诗“已经走到了一个分歧的路口”,自由诗已是“一条无展望的绝径”,“除了发现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我们看不见可以引我们实现或接近我们底理想的方法”。由此,“诗特刊”发起了一场创作实验,强调探索和发扬现代汉语的语言特征,寻求与之相应的诗歌写作策略。在此过程中,梁宗岱多次重提屈原、陶渊明、陈子昂、李白等人的诗学遗产,意图沟通古今中外,建立一种具有综合特质的“东方象征诗”和汉语的“现代诗”。在兼顾文化和语言两个层面的基础上,“诗特刊”着重探索新诗格律,强调“探险、洗炼,补充和改善”新诗的语言,“以中西容”、“以新纳旧”,希望最终找到一条充分体现现代汉语语言特征与优势的独特道路。今天看来,梁宗岱指出的或许并不是最合适中国新诗的道路,但其立足汉语写作、力图确立中国新诗主体意识的独特思路仍深具启发意义。他将西方“纯诗”理论中的“音”“义”结合的思想与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格律化的艺术方式相结合,不仅联接了世界诗歌与汉语诗歌,同时也联接了现代诗学理念与古典诗学传统,其理论意义已超出了格律探索本身。

从胡适、闻一多,到废名、梁宗岱,这一粗略线索代表了早期新诗在借鉴外国诗学和艺术本土化方面的部分思考与探索:无论是立足语言、探索格律,还是重释旧诗、关注文化,又或者是更加强调现实历史的关注与介入等等,这些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各有推进、各有收获,共同构成了中国新诗本土化探索的历史图景与传统,也成为百年新诗的宝贵遗产。“本土化”并非周全严谨的文学概念,但它的确提供了一个视角,有了这个视角,写作者得以更加自觉地关注“此地”与“今时”,关注写作所面对的各种对话性语境。这是一种自觉的“当下写作”与“在地写作”,它真正符合大多数诗人运用和锤炼自己的语言、写出自己的文化与现实体验这一朴素而终极的目标。

(上接第1版)

10月29日下午,学员们来到井冈山大学,参加中国作协“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暨优秀文学作品诵读会。这是此次文学社会服务实践的重要内容。白烨以《经典是写出来的——〈平凡的世界〉出版的前前后后》为题,从“尽心尽力书写精品力作”、“用心感受现实主义的生命力”、“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的相互鉴定”、“作家之间要良性竞争”四个方面,为井冈山大学师生、吉安市文学爱好者和培训班学员作了精彩讲座。白烨谈到,《平凡的世界》表达了人人共有的情感,尤其是有乡村背景的人在逆境中向上攀登的勇气,因而深受一代代读者的欢迎。这说明现实主义创作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为人民书写才更容易获得人民的喜爱。讲座之后还举行了优秀作品朗诵活动,在古代的作品和当代的作品之间,在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之间,文学带来的暖意抚慰着每一个人的心。

彭学明在活动总结中希望学员们以井冈山精神铸造文学的灵魂,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感受人民的火热生活和伟大的创造实践,汲取丰富的创作营养,以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反映时代气象、弘扬正能量,更好地促进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专家探讨《马伯乐》(完整版)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近日,由中国出版集团主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承办的“跨越世纪的书写——《马伯乐》(完整版)文学沙龙”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外联部副主任李锦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国辉,以及《马伯乐》续写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汉学家顾彬、安乐哲、作家、评论家刘震云、陈晓明、雪漠、王宁等参加活动

《马伯乐》是萧红生前最后一部未完成之作,葛浩文自述了自己多年阅读、研究萧红文学的经历,他用英文续写完成了《马伯乐》,由其夫人林丽君教授翻译。李锦琦表示,中国文学在海外阅读与研究状况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这方

面,海外汉学家、翻译家群体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与会专家表示,好的翻译家不但要懂文学,而且要懂文学里较高的境界,理解民族的生活和思想。萧红小说在结构上的荒诞和幽默通过葛浩文的续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萧红笔下,马伯乐是一个中产阶级阿Q式的人物,而在续写的故事中,他的命运结局得到了升华,从一个软弱无能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对振兴民族国家抱有坚定希望的觉醒者。马伯乐在历史的变动中完成了一种对自我的重新确认,这是译者对萧红和鲁迅思想充分理解后有意识的改写,也表达出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

《百年巨匠——饶宗颐》开机

本报讯 10月18日,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饶宗颐》开机仪式在香港大学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王志民、香港大学校长张翔、《百年巨匠》总策划李琳、《百年巨匠》出品人兼总策划杨京岛等出席。

历经百年沧桑的国学大师饶宗颐毕生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在诸多领域皆有卓越成就和突出贡献。《百年巨匠——饶宗颐》由中国文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艺术研究院、百年艺尊(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摄制。作为《百年巨匠》国学篇的开篇之作,该片力求全方位展示饶宗颐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画卷,讲述他如何一步步成为蜚声中外的学术巨匠的故事,充分展现其学术研究的艰辛、传承创新的精神以及在汉学领域重要的学术创造,深层次探索一代大师的心灵世界。该片将于2019年拍摄完成。(范 得)

“杜蒙·阅途”系列图书首发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0月24日,由北京出版集团旗下京版梅尔杜蒙(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杜蒙·阅途”系列图书发布会暨“带着杜蒙去旅行”启动活动在京举办。

“杜蒙·阅途”原版图书由德国梅尔杜蒙公司推出,在欧洲畅销近30年。加上此次面市的中文版,已被译成8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1亿册。作为旅行指南类图书,该书涵盖了食、住、行、娱、购等旅游必备信息,还包括当地锦囊、独特体验之旅、禁忌事项等实用建议,

外形设计小巧精致、便于携带。该书中文版不仅保留了原版中的内容和详尽的地图,还增补了数十位旅行达人提供的旅游攻略信息。目前该系列图书已推出近30个品种。

京版梅尔杜蒙公司自2014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承“做最好的旅游内容提供者”的出版理念。今后,该公司将围绕该书内容,联合高校、旅行社、自媒体旅行达人和旅行爱好者开展“带着杜蒙去旅行”系列活动,点燃参与者的旅行激情。

第十五届海淀文化季开幕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0月23日晚,随着“最好的文化属于人民”主题文艺演出的举办,由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委员会举办的第十五届海淀文化季在海淀剧院拉开序幕。演出涵盖歌曲、舞蹈、朗诵、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无人机表演等尽显海淀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区域特征。

海淀文化季创办于2004年,现已与“海之声”新年演出季、“海之春”新春文化季、中关村国际青年艺术季和中关村金秋演出季等,共同形成海淀区缤纷四季的群众文化艺术新生态。为庆祝改革开放40年,结合海淀区成功创建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本届海淀文化季将通过“人民的节日——中秋、十一、重阳活动”“创新跨越——‘文化新地标’巡礼活动”“海潮奔腾——创建与改革开放40年活动”等8个单元的49项、200余场活动,充分展示海淀区推进文化和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辉煌成就。这些文化活动将历时3个月,实现海淀29个街镇全覆盖,力求展示海淀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高品质、均等化和独特的文化底蘊。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浙江传媒学院40周年校庆之际,为更好地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加强创意写作人才培养的合作,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文化产业培养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人才,10月21日,由浙江传媒学院与浙江省作协主办、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承办的浙江传媒学院40周年校庆论坛——“首届华语创意写作周”在浙江桐乡举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吴思敬、浙江传媒学院副院长姚辛、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曹启文在开幕式上致辞。十余位作家、编剧和专家学者与会展开交流研讨。

历经40年发展,浙江传媒学院已逐渐形成教学、科研、创作、社会服务协调发展的“四轮驱动”格局,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亦取得了积极成果。活动期间举行了浙江传媒学院创意写作中心揭牌仪式,作家叶炜担任该中心主任。

浙江传媒学院举办首届华语创意写作周

的主题沙龙:在“学术沙龙”上,吴思敬、方群、晏榕、叶炜围绕“创意写作人才培养的路径探讨”畅所欲言;“编剧沙龙”邀请倪震、程蔚东、海飞、袁帅针对“青年编剧的成长与编剧原创力的提升”这一主题展开交流对话;蒋胜男、管平潮、牛骥、鲁强齐聚“作家沙龙”,就“文学新力量:跨界与生机”各抒己见。大家表示,创意写作人才培养是时代的需要,也是高校写作教学实践发展的必然。希望浙江传媒学院努力打造传媒文学品牌,不断推动创意写作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活动期间举行了浙江传媒学院创意写作中心揭牌仪式,作家叶炜担任该中心主任。

专家研讨路远新作《布里亚特女裁缝》

本报讯 近日,路远长篇小说《布里亚特女裁缝》研讨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内蒙古文联主办,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内蒙古作协承办。

《布里亚特女裁缝》以叙述人“母亲”的生活经历为主要线索,小说将与母亲相关的人物事件与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背景相联系,从一个汉族女性的视角建构出一部布里亚特民族史。与会者谈到,小说文本展示了路远足够的创作耐心与雄心。通过一个年轻的汉族女人的逃亡,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双线结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叙事之中,打破了路远以

往靠情节转折与堆积所带来的感觉,揭示出其背后更深邃的历史性困境。《布里亚特女裁缝》承载了路远小说曲尽离奇的一贯风格,但背景却是新旧交替的社会和动荡不安的历史时代,每个人都接受着社会与时代对其人性的考验与拷问。在这部作品中,人物性格更复杂,更具血肉感,作品有了广度与分量,而其缺憾在于人物的性格还不够深入。

赵晏彪、张志忠、兴安、高海海、刘川鄂、千华、哈斯乌拉、魏永贵、奥奇、邓九刚、郭晓东、庆胜、杜梅、李悦等与会讨论。

(宋 喻)